

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.

Milan Kundera, *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*

什麼樣的歷史描述不能帶來和平？

史學像是一面鏡子。我們怎麼對待過去，往往也會那樣界定未來。

台灣社會目前真是病了。如十月 29 日蘋果日報社論說，「台灣的虛假沒有禁區」，舉凡黑心食用油、商品到總統與立法院長在國慶日上的故作親密、惺惺做態。台灣在公共利益、關鍵道德、核心價值和法律要件上一樣會弄虛作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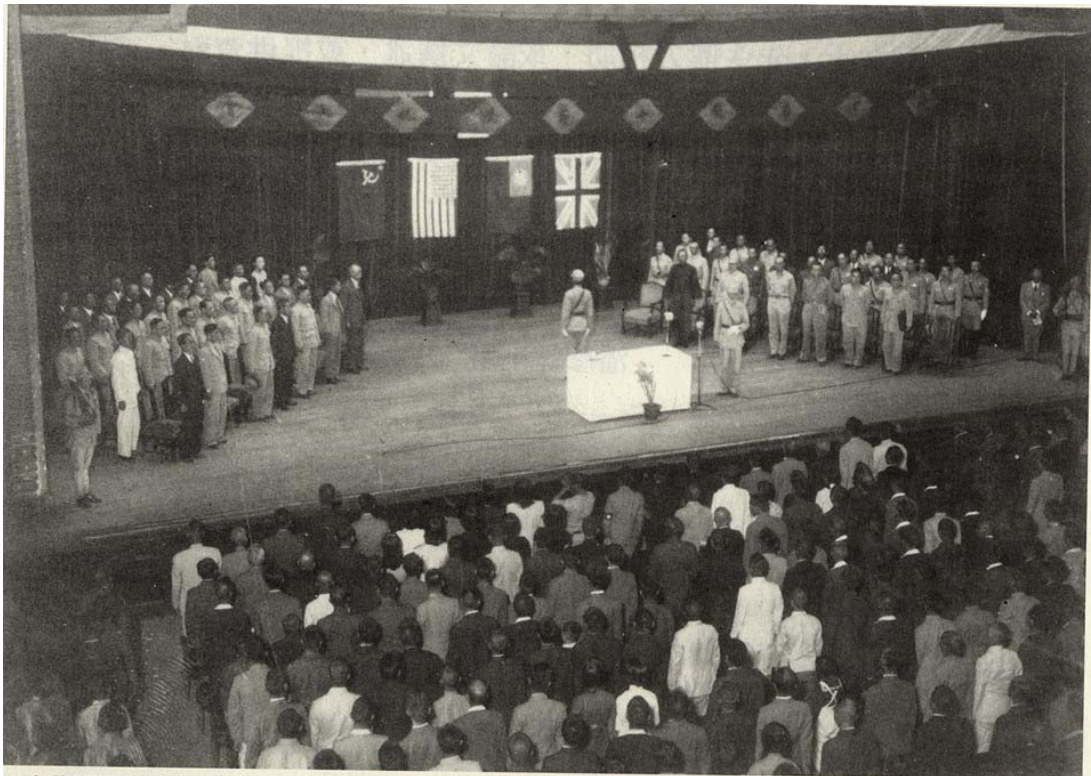
此病或許有某部分來自歷史教育，將歷史塑造成強者的紀錄。此病或許當我們改善歷史描述時，會帶來和平，會獲得撫慰或療癒。

什麼樣的歷史論述，才會真正帶來和平呢？我想有三大指標：一、誠信；二、同情弱勢，大家願意為弱小、悲傷或受壓迫的挺身而出。不爽時，總找得到人傾聽、培力(empowerment)；三、不輕易裁斷(judge)。社會和平不能沒有誠信，否則最近的毒油、毒商品事件也不會造成我們那麼大的恐慌與鬱悶。社會和平不能不同情弱勢，否則眾暴寡、強凌弱，二戰期間德國種族滅絕慘劇，將會重演。社會和平不可能藉由未審先判達成。沒有人喜歡受裁斷。彼此寬容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。

沒有誠信的歷史描述，就不可能塑造和平的體制與社會

我們的社會不誠信，有部分就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教育如此。就史學與史實而言，眾所皆知，我們的高中歷史課本一塌糊塗。如 2011 年，台大歷史系主任甘懷真在新生座談會中，勉勵熱愛史學、選擇史學的新生，忘記中學所學的歷史。因為那是偽史學、非史學甚至是反史學。我們歷史課本無法面對二二八事件，根本不是官逼民反，因為民眾根本沒反，只是挺身而出維持治安。我們歷史課本無法面對鄭成功、劉銘傳屠殺很多原住民，卻一直將其視為台灣文明化與現代化的英雄。我們的歷史課本無法面對，日軍投降的對象，根本不是中國，而是同盟國。日本是將台灣交給同盟國手中，而非中國國民政府。……這種什麼都不敢面對的歷史描述，當然也塑造了我們那個莫名其妙的總統，到現在還把外蒙古當作是我們的領土。

這種不誠信，自然也塑造了我們醫療糾紛頻仍的禍根：隨意竄改或簡化病歷表。此禍根又造成了台灣不和平、不得安寧的醫療體制。台灣有四萬多名醫生，據說有一萬多名從事醫美科。換言之，有四分之一的醫生選擇為有錢人服務。我們不能怪那些醫生太愛錢，其實他們有一部分是因為避禍，盡量遠離刑事訴訟。台大醫院，醫師都嚮往的白色巨塔，年前召募四個婦產科醫師，竟無人來應徵。更慘的是花蓮市，只有一個婦產科醫師，多年來已經不知道甚麼叫休假，或回家安穩睡覺，因為都得在醫院值勤待產。台灣醫師婦產科、外科和急診科極缺，並非因為沒市場、不搶手，而其實是因為訴訟風險太高。被迫躲在法律陰影下的醫師是受害者。然而，病患同樣也是受害者。台灣醫師為了避禍，病歷描述減之又減，保留詮釋的彈性空間，還用英文或拉丁文寫成。這種病歷說明對患者而言，彷彿天書。可是，我們知道很多醫療事故並非人為因素，而是藥品包裝太相近、或位置擺放有問題。而且就算是人為因素，醫師太累或醉了等等，我們如果知道真相的話，可以好好研擬對策根治的 {請參閱傅大為，2003，倉皇奔逃中的白袍醫師—從醫療糾紛到醫療體制，科學發展. 月刊，第 361 期（2003 年 1 月號），第 79-80 頁}。很不幸的，醫師為了避禍躲在法律陰影下，連帶也將真相遮蔽了。所以，台灣就一直有居高不下的醫療糾紛，如比美國高好幾倍。可是，醫師定罪率卻遠比美國還少很多。病患或家屬為了保障自身權益，只好使出黑道恐嚇或抬棺抗議的手段，嚇得台灣醫師五大皆空。



日軍向同盟國投降的照片

沒有同情弱勢的歷史描述，就不可能塑造和平的人權價值

我們的歷史描述又特別喜好跟隨主流當道的聲音，對於其違反人權價值也了無深思。如在所謂「新疆」與「西藏」問題上。我們的翻譯，其實還在天朝時代，稱新疆不稱東土耳其斯坦，稱西藏不叫圖博。作家席慕容就認為這樣的翻譯，極盡貶抑之能事。又我們的歌頌左宗棠為民族英雄，收復回疆，卻不提漢人對回人的壓榨和左宗棠在西寧的大屠殺。如林語堂在《朱門》一書中這麼描寫，「冷血的大屠殺，無辜百姓、婦孺都不能倖免」，「屍體堆積如山，路邊、門檻到處可見。一堆堆血淋淋的人體與焦骨，有些是被殺死的，有些是被餓死的。肥了野狗，飽了兀鷹，整個山谷充滿死屍腐肉的臭氣。空無一物的城鎮，倒塌的煙囪」。我們台灣立國精神強調人權，卻把殺人萬萬的左宗棠視為民族英雄，是何道理？

有關圖博主權問題。台灣課本似乎無條件接受中共說法，「七百多年來，中國中央政府一直對西藏地方行使主權，西藏地方從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」。不僅如此，我們也無視此說法中所隱含的人權議題。如 1951 年中共以解放軍兵臨城下的軍事威脅，迫使圖博人簽署「十七條協議」，卻又違背「協議」，以社會主義的教條，企圖改寫圖博人的宗教文化與社會結構，結果引發 1959 年圖博人起義反抗中共政權，立刻換來中共的血腥鎮壓。據估計當時共有八萬餘人死亡，數千民政治犯，無數的寺廟遭到搗毀，迫使達賴喇嘛與十萬餘民追隨者流亡海外，淪為「難民」。到今天，圖博人在拉薩街道買東西，只能用漢語溝通了，因為拉薩居民八成已上都是漢人。

這種打壓弱勢者的歷史描述，真是台灣需要的嗎？邱延亮說的好(中國時報，2011-07-17)，一個社會的文明發展，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用弱勢者的待遇來檢驗。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遊客在街頭得到的協助，是不是和推著老人的菲傭遇到困難時得到的協助一樣？多金觀光客說台灣好，很讓人高興；但在我們之間生活的弱勢者也說台灣好，可能更有意義。

可惜在這方面，仍然陸續傳出過一些讓台灣人感到丟臉的事，例如雇主強迫信回教的印勞吃豬肉、甚至予以虐待性侵，或者對外來新娘及第二代排斥歧視。其實，不要說外來移民，長期以來，原住民、殘障等弱勢族群，在就業與社會資源方面就一直處於劣勢。台灣固然是個有情社會，但往往缺乏體制性的落實。

倒不是說台灣人勢利眼，而是有些長久存在的差別觀念或歧視習性，還沒有得到我們深刻的反省與糾正。對偶遇的外人友善比較容易，但對在經濟能力與社會地

位比我們弱勢、甚至要依靠我們過活的人，能夠給予體諒、照顧及尊重，可就是很不容易了。

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有很多指標，如何對待弱勢者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其實近年來我們在這方面一直有在努力，從成立原住民委員會、外配生活輔導、到設立外勞保護專線等等，但如果由外勞外配來談台灣印象，也許會呈現的會是另一個不同的台灣。

台灣值得給自己肯定，但也需要完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長處與短處，受到稱道的優點需要繼續堅持，不足之處也應該虛心檢討並努力改進。與其自我耽溺於讚美聲中，不如更切實反省自己尚有不足的地方，並且力圖讓台灣成爲一個更溫暖美好的地方。來自弱勢者的肯定，將更能彰顯台灣的價值。

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讓我們從歷史描述開始，建立台灣爲弱勢發聲的人權價值。

不輕易裁斷的歷史描述，才能塑造一個寬容、更和平、更適合人居住的台灣

華人常以文字褒貶來賞善罰惡。如我們今天還會爭執到底要用日治還是日據。又如胡適（〈名教〉，1928）舉標語爲例說：「五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，每一次四十分鐘的旅行所見的標語，總在一千張以上；出標語的機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，有寫著『鎗斃田中義一』的，有寫著『活埋田中義一』的，有寫著『殺盡矮賊』而把『矮賊』兩字倒轉來寫，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『人』字一樣，『人』字倒寫，人就會回來了；『矮賊』倒寫，矮賊也就算打倒了。……說某人是『忠實同志』，便是教人『擁護』他。說某是『軍閥』、『土豪劣紳』、『反動』、『反革命』、『老朽昏庸』便是教人『打倒』他」。

我們的歷史課本往往也很快跳入裁斷，如說吳佩孚是軍閥。可是，他是前清秀才充滿文采，又極愛國，不借外債，不受外國勢力操縱，甚至逃亡時也不住租借。這樣的人是反革命、軍閥和反動分子，那麼誰才能符合史論所隱含的價值觀呢？

過度強烈的春秋筆法，片言隻字就想讓人留芳千古或遺秀萬年，反而無法帶來和平，而是琳琅滿目的文字獄。

如袁世凱帝制瓦解後，北洋軍閥割據稱雄。撰寫中國第一本新聞實務教科書的邵飄萍，支持馮玉祥的國民軍對抗奉系張作霖，一九二六年四月反奉戰爭失敗，國民軍被迫退出北京。邵飄萍不僅不肯離京避難，反而在國民軍撤退後第二天在《京報》發表署名文章〈歡送國民軍〉，宣稱「本報對於國民第一軍始終示愛護之態度」，祝願它在退居西北後得到發展。奉軍進京後，立即誘捕邵飄萍，以「勾結赤俄、宣傳赤化」的罪名將他判處死刑，新聞界聯名向張學良求情無效，一代新

聞奇才從容就義。

又如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北伐，兩年後完成統一。一九三〇年展開「剿匪」行動，九一八事變爆發後，蔣中正堅持「先安內後攘外」，繼續「剿匪」。一九三二年夏天，中國最具代表性的企業化報紙《申報》主持人史量才對「剿匪」政策不以為然，先後在《申報》刊登三篇時評〈剿匪與造匪〉、〈再論剿匪與造匪〉、〈三論剿匪與造匪〉。文中說：今日之「匪」皆黑暗政治造成，政府在政治上「造匪」，又一面「剿匪」，政治不清明，民生不安定，即使武力圍剿十次，亦必無功。這樣的言論觸怒當道，蔣中正旋即批示「申報禁止郵遞」，三十五天後才恢復。後來，史量才又拒絕國民黨派員指導《申報》的編輯和發行。兩年後，史量才慘遭暗殺。

又如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，事件初期的報紙多數同情群眾，連隸屬於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《台灣新生報》，都在三月一日發表社論抨擊陳儀政府處置不當。《台灣新生報》對於群眾和官方的說法平衡處理，對群眾行動的報導更是力求中性，如學生佔領台中機廠就以「台中機廠由學生警衛」敘述。然而，三月八日國軍從大陸來台展開鎮壓，三月九日《台灣新生報》總編輯、總經理、印刷廠廠長、高雄和嘉義分社主任等人慘遭捕殺，三月十日停刊一日，三月十一日復刊後筆鋒丕變，痛罵群眾是「叛徒」，重新發表社論說二二八的發生是受日本奴化教育影響的群眾，在不負責任的新聞界煽動下發生的。

我們的社會酷好裁斷。許多中性的英文詞彙，在中文裡很難找到完全對應的中性譯法，如die，不管譯成逝世、喪命、死了、斃命都有褒貶意味，都不超然客觀。華人語文系統為何充滿褒貶詞彙？這或許可能是史家和文人在講人倫、重名聲、迷信文字的文化氛圍中，在帝王權臣專橫、筆禍不斷的現實環境中，為了激揚名教、記實避禍所逐漸發展出來的，如孔子在《春秋》中明訂殺、誅、弑等字的用法和意涵；這些詞彙被發明之後，成為華人語言系統的一部份，又進一步影響後世史家和記者的記事報導，迫使他們必須分清是殺是誅還是弑，從而予以褒貶。這就形成一個社會文化影響語言、語言又影響社會文化的循環，最終使中文充滿褒貶、大家難以客觀，更難以自在。褒貶之網，無所不在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

所以，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此傳統，或此語言系統，不要輕易陷入褒貶裁斷的歷史陷阱中。要有不輕易裁斷的歷史描述，才能塑造一個寬容、更和平、更適合人居住的台灣。

總之，我們的歷史描述還有許多問題，如輕易裁斷、忽視弱勢者的聲音和信實等等。尤其在牽涉到主權或敏感政治議題上，這些歷史描述特性往往會為我們帶來殘酷的人間煉獄，而非和平。